



“第六届抗日战争史 青年学者研讨会”综述

2019年5月11—12日,由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华南抗战历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的“第六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在华南师范大学召开。本次会议征集到论文162篇,经论文遴选委员会按匿名评审程序,从中选出36篇参会。来自全国2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的5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战时军事、民众动员、沦陷区域、中共抗战、战时经济、战时文教和战时外交七个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现撮要综述如下。

一、战时军事

军政或军事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以往对军事参谋的研究多集中于北京政府和国民党军队,有关中共武装的参谋机构大多停留在泛泛梳理和回忆层面。南京大学肖晓飞《走向正规化:新四军参谋工作初探》梳理了面对参谋人员能力薄弱、素质低下、人才匮乏,参谋部门地位和威信低落等困境,新四军一方面大力开展参谋人才教育、训练,一面完善制度,规范管理,使参谋工作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逐渐正规化的过程。该文指出虽然新四军的参谋工作无法与日军乃至国民党军队相提并论,但其兼具作战谋划和军队建设等多重任务,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南京师范大学叶铭《业务纽带:浅析抗战时期联络参谋与参谋视察制度》指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建立联络参谋和参谋视察制度,目的是解决参谋业务的组织不全、联络不畅、情报不准、计划不周、执行不力等弊端,而由于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组织机构不健全、参谋机构定位不明确、人员能力和操守等问题,导致最终未能实现上下联系沟通的设计初衷。

豫湘桂战役是抗战后期一场重要战役。华中师范大学贺怀铎《蒋介石与豫湘桂战役的决策及因应》通过剖析蒋介石个人在豫湘桂战役过程中的敌情判定、布防指导,挖掘其决策的利弊得失,指出,不能简单化理解蒋此时的消极避战。战争是双方的互动,故研究视角不能忽略日方和国际。

中日战争和欧战相继爆发后,英国在远东地区势力进一步衰落,但并不甘心放弃其在殖民地的主导地位。北京大学姜子浩《国际视野下英国在华军事组织的合流和挫折——以1945年特别行动处(SOE)在两广扶植亲英武装的提案为中心》揭示了英国对华军事机构以打击日军、策应盟军为幌子,在两广扶植亲英武装势力,实则为了恢复香港统治培植先导力量的企图,但在英国实力下降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国际局势下,未能起到预期作用。

七七事变前后,国民党地方部队的整编和出省抗战是全面抗战的重要内容。北京大学尹晓宇《蒋介石与1937年川军的整编及出川》分析了1937年川军从接受整编到出川抗战的历史过程,指出整编和出川是两个环节,前者留存资料较多、研究较深,后者材料相对较少、研究薄弱。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曾经寄希望于“日苏先战”,而斯大林则为避免两面作战,展开对华军事援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林威杰《俄械东来:张冲与抗战初期的一次军事援助》一文,以张冲为线索,梳理了国民政府派遣实业考察团,行前争取中共特别是周恩来等的联络支持,经过几轮谈判争取苏联军事援助的过程,指出,“俄械”的确改善了中国军队的火力装备,增强了战斗力,但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始终以“中日先战”“以华制日”的国家战略为前提而有所保留。

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是近代中苏军事合作抗日的重要内容,以往研究较多关注其战场作战的表现。南开大学安德《苏联空军志愿队在华(1937—1941年)的日常生活》则聚焦志愿队的日常生活形态,突出他们在华期间的另一方面。该文所牵涉的“日常生活”概念,与“作战”本身如何区分,战场形势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等,在会上引发了热烈讨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盟军开展军事合作,而合作中也有摩擦。浙江大学徐亮《战时合作的“中间人”:中国战区盟军青年译员研究》从多维角度探讨青年译员的“中间人”角色,他们待遇上较中方一般文职人员及普通官兵为优,但与美军职员相比仍然悬殊,且面临中美文化隔阂和种族偏见,需要在国民政府要求保持“国格”尊严的前提下维护“人格”平等。与以往研究侧重线性单向视角,较多强调国民政府的征调、培训、管理和青年译员的贡献不同,该文丰富了对青年译员经历的认识。

二、民众动员

学界对于国民政府的征兵工作已有较多研究,但偏向兵役制度和机构,对基层执行过程的研究相对缺乏。华南师范大学周少雅《抗战时期广东的兵役》一文指出,抗战时期广东征兵起步虽然较晚,但着力落实军、(师)团管区和各基层组织的系统联动,从壮丁、保甲、乡(镇)公所、县政府到接兵部队形成完整链条,为征兵工作完成提供了制度保障。会议认为,该文如能将广东华侨应征的内容纳入,视野和内容仍可扩充。

抗日战争是全民抗战,国民政府也不否认民众的重要性,但总体上更多依赖军队。华南师范大学李浩《“军民合作”:国民党在广东的民众武装工作——以民众抗日自卫团为例》研究了国民党广东当局组建民众抗日自卫团协助抗敌的目的、过程和意义,指出这对国民党发动民众武装斗争具有一定特殊性。在华南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由于国民党民众武装动员机制存在缺失,民众抗日自卫团开始蜕化,许多被中共争取或被日伪拉拢,国民党广东当局将其缩编或整编为游击部队,失去了大规模武装动员民众的动力,形成单纯依靠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影响深远。

军政分治是抗战时期广东有别于其他国统区军政合一的显著差异,对于华南抗战影响很大。华南师范大学王英俊《抗战后期广东军政关系再探(1944—1945)》一文揭示了抗战后期广东军政分治根源于粤军的派系化和蒋介石对粤人的互相制衡策略。余汉谋主导的第七战区和李汉魂为主席的广东省政府的持续对立,历经争夺省银行、地方武装的控制权斗争,后者尽管使出浑身解数,但最终仍然黯然下台,并落入蒋介石的驾驭圈套。

近代以来的边疆研究在抗战时期达到兴盛,各科学者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将边疆民族纳入抗战建国进程的实际工作。华南师范大学杨思机《抗战期间顾颉刚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考述》考证了顾颉刚受朱家骅邀请,暂时主持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并意图促进边疆文化和内地文化交流,扭转国民党中央偏向边疆民族说教的单向性边疆政策的历史,加深了学界对顾颉

刚从事边疆研究和投身抗战动员活动的认识。

1939年2月,蒋介石组建国防最高委员会,其渊源流变学界以往较少关注。复旦大学张焱明在《王宠惠与国防最高委员会“国际问题讨论会”》一文中指出,国防最高委员会继承了国防最高会议的决策身份,壮大了蒋介石的智囊团队和幕僚组织,加强了其个人集权。同时,该文梳理了王宠惠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下组建“国际问题讨论会”的经纬,认为“国际问题讨论会”的运作最终使国防最高委员会在国民党战时顶层设计中的地位逐步边缘化。

三、沦陷区域

伪满洲国建立后,关东军控制下的东三省民众如何经营日常生活,是沦陷区日常生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师范大学林晓萍《日常生活中的消极抵抗——以“满洲国”为例》认为,上至以溥仪为代表的旧清朝君臣,下至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对日本和关东军的“消极抵抗”。由于伪满洲国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溥仪的不满不能完全等同于抵抗,学生抵抗教职员与抵抗伪满洲国和日本的界限也要鉴别,故而林文在对“消极抵抗”的界定以及材料和题目搭配等问题上尚需斟酌。

对于1935年驻华日军策动华北将领“自治”,日本外交人员的处理态度存在一些分歧。四川师范大学左春梅《日本外务省与1935年华北“自治”运动》指出,日本在华外交人员分为和缓谨慎和强硬激进两种观点,驻华大使有吉明等主张在承认国民政府交涉方案的基础上,通过华北实力派实行“自治”;南京、天津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川越茂则主张强硬。外务省中央支持激进和强硬派,不重视缓和派,这反映了两派日本外交人员对华政策的意见分歧乃至路线之争,揭示出对华缓和政策存在但无从实施的复杂面相。

日本承认汪伪政府后,着意减少侵华战争消耗,施行在占领区获取战争资源的战争方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展在《“舍”与“得”——1941年汪精卫访日与日本内部博弈》一文中指出,1941年在日本驻华军政机关向日本政府施压下,汪精卫实现访日之行。汪访日的目的是促成日本调整政策,减轻汪伪政权的生存压力,而日本政府却将其降为礼仪性访问,不做实质性政策调整,这反映出日本内部博弈不会违背其侵华的根本利益。

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是一支从应对战时军马需要而编设的临时军马收容所,发展为专门从事炭疽菌、鼻疽菌、斑驳病菌等细菌武器研制与实战的细菌部队。伪满皇宫博物院赵士见《多边档案互证下侵华日军第一〇〇部队再研究》运用多国史料,更为细致地勾勒该部队的沿革、机构设置、人员构成、职能从“检疫”到“防疫”再到“施役”的转变过程等环节,有力揭露了该部队成员走上国家性战争犯罪的罪恶行径,批判了他们在日本战败后企图销毁证据,逃脱审判的行为。

在思想上为叛国行为提供遮羞布,是伪政权费尽心量的事情。北京师范大学付耶非《塑造新“正统”:敌占区政权历史教科书的历史书写与政局互动》一文认为,华北伪政权和汪伪政府试图通过编撰新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为其政权增强“合法性”,主要表现在标榜中国的“传统”和“民主”,否定国民党的“党治”和孙中山以来的“法统”,以及解释日本占领的现实合理性,回避对日本侵华的不利言论两个方面。该文较以往仅从民族主义角度批判“奴化教育”增加了透视沦陷区和国统区文化互动关系的视角。

四、中共抗战

2018年是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80周年,毛泽东“持久战”的思想渊源、自身特点和具体动

机备受学界关注。南开大学金伯文《抗战时期〈论持久战〉在中共中基层群体中的传播与接受》初步梳理了《论持久战》在中共的军事和社会教育体系中的传播和受众的特点。金文指出,围绕《论持久战》,对中高级干部要求自修并深入研习;对下级干部注重基本理论与政策的教育;在基层则侧重民族意识教育以及对政治常识与文化知识的学习。最后通过立场教育,中共实现了对“持久战”话语权的排他性占领。

如何整合中共控制区域的“杂色武装”,成为中共锻造新式革命武装的重要内容。南方医科大学刘意的《抗战时期中共对晋察冀边区“子弟兵”的锻造研究》从“子弟兵”称号的由来、正规化、发展以及“子弟从军是最大光荣”的意义等方面,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晋察冀边区“子弟兵”锻造的基本路径。“子弟兵”锻造不是纯粹的军事问题,而且涉及军民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八路军士兵的日常管理,可以鲜活反映中共部队的特色。以往关于中共革命中的医疗卫生问题,焦点在医疗救护。南开大学宋弘《抗战时期华北八路军士兵的日常卫生》一文指出中共采取动员和教育等多种措施,注重八路军士兵的个体卫生和加强对环境与公共卫生的管理,培养了士兵注意日常卫生的生活习惯,强化了军队和民众的密切关系,有助于提高战斗力。

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和革命态势,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党组织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吉林大学武洋《满洲省委时期东北地区中国共产党组织形态的内部考察——基于下层视角的组织互动与组织运行》从下层视角梳理了中共满洲省委对朝鲜民族加入党组织带来的冲击、信息沟通不畅、组织生活散漫等问题进行干预和整顿的过程,揭示了处于弱势领导地位的东北党组织在严酷革命环境下生存和运行的复杂性、多面性。

在中共革命历史上,个别军政人员的动摇乃至叛变时有发生。天津商业大学杨东《战时军政人员的动摇叛变——中共应对与国共论争》梳理了全面抗战期间中共军政人员叛党叛国的主要代表和变节的具体原因。该文指出中共及时制定系列正确的应变方针和善后措施,消除了恶劣影响,领导军民顺利渡过了难关,并且从民族抗战的立场驳斥了国民党的无理指责。

五、战时经济

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基层财政管理事关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和稳定。清华大学李叶鹏《抗战时期太行、太岳根据地基层财政管理制度研究(1937—1945)》一文利用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太行、太岳根据地的村公所账本,考察了在抗日根据地整理村级财政颇具影响的基层财政管理制度,以及杜绝财政浪费方面的情形。至于村公所作为执行层面,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县级财政管理制度,以及如何对账本进行选择等问题,会上认为可以进一步讨论。

1940年成都发生两次抢米风潮,反映了大后方粮食危机的初起。四川大学陈默在《战时后方粮食危机的初起——以一九四〇年成都“米潮”为中心的考察》中指出,米荒是通货膨胀、粮食歉收、囤积居奇、应对失当等多种原因互相作用的结果。国民党四川当局最初通过封仓平糶的办法平息了第一次风潮,但误判中共地下党为幕后黑手,在第二次风潮中既缺存米又乏资金,加上作弊不断,导致米价失控,激起民众反抗。国民党的政策疏漏和应对失误是粮食危机的重要诱因,无法根本上有效解决粮食供应问题。

国民政府建立后,一直致力于对出口贸易的统制。河北师范大学李中庆《运输困境、战时贸易与权力渗透:抗战伊始国民政府出口贸易统制的建立》梳理了淞沪抗战爆发后至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建立出口贸易统制的过程:先通过中央信托局推出运输兵险保障商品运输;成立贸易调整委员会调整贸易结构;在长江流域重要贸易中转站江阴、南京沦陷后,出口贸易主要通过国民政府控制的粤

汉铁路运出;借此机会整合中央和地方贸易机构为贸易委员会,正式建立了对出口贸易的统制。

日本发动侵略的战争机器,需要经济上的配合和支撑。南开大学郭循春《战争补给站:日本陆军秘密军策会社昭和通商》初步梳理了由日本陆军中央指导的昭和通商株式会社的建立、结构、性质和主要活动,揭示了其帮助日本陆军出口武器、进口战略物资、运输鸦片、调查军事情报,在世界各地攫取战争资源,为德、意法西斯提供矿产和武器物资的罪行,为深化理解日本侵略者如何推动战争进程提供了具体的例证。

六、战时文教

关于国民党对大学的治理,学界往往从批判“党化教育”角度展开研究,但历史是复杂的。南京理工大学陈钊《教学与卫道:赖琏与西北工学院、西北大学的治理》一文认为,国民党中委、CC系骨干分子赖琏兼长两校,通过争取大笔经费,清除左翼学生,强力压制国民党与三青团、CC系与朱家骅系的党团派系斗争等手段,获得师生的支持,说明国民党的“以党治校”理念在当时大学治理中有其生存土壤。无论是关注大学治理的制度构建,还是聚焦大学卷入的学潮政争,民国大学史研究都不能离开大学是学校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本质角色。这两所高校在学科发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究竟取得哪些进步,无疑也是检验赖琏治校成功的重要标准。

近年来,战时的生活处境逐渐成为抗战史研究的一个新鲜话题。中山大学董丽琼《抗战期间中学生的认知、处境与心态——以温州为例》以温州几所中学校为对象,考察了青年学生个体在战争面前的复杂心态和多重选择。他们抵抗或撤退、从军或苟安,很难用“民族主义”的标签简单涵盖。至于战时经历和不同抉择在他们的人生轨迹上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值得进一步追究。

大学教员工资待遇是近年来民国大学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南京大学牛力《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教员薪津的演变》一文有助于深化理解国民政府对大学教员的救济和补助。该文指出,抗战期间国立大学教员薪津有显著变化,初期受物价上涨和折减影响,较战前为低,1940年后通过补助政策,薪津结构发生变化,非常规薪津超过传统薪俸,改变了大学教员的薪津格局。低薪教员普遍享受补助福利,而教授薪资陷入低谷,直接催生了后期的学术奖助制度。

对于沦陷区大学的研究,以往多集中于教会大学,国立大学留在沦陷区的教职员或私立大学未引起足够重视。南京师范大学严海建《表里不一:沦陷时期的何其巩与北平私立中国大学》认为,北平私立中国大学虽没有西迁却与国民政府保持联系,没有治外法权却未被日伪接收,在战时环境下仍有所发展,根本上取决于校长何其巩妥善处理与各方的关系。该文为深化理解沦陷区的大学提供了新视角和样本。

自由和统制的关系是近代新教育中国化的难点,国民党从未放弃统制教育。华中师范大学张欢《1941年国民政府整顿学风令的出台与反响》指出,国民政府将重庆大学的学潮原因简单归咎于学生学风不良,在解散重庆大学的同时颁布《整顿学风令》,目的是借此加强教育统制,引起学术界、教育界、华侨和中共的强烈批评。由于整顿学风设计本身有局限,教育部又未能为有效改良教育现状提供配套支持,而是一味强化党化教育,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

七、战时外交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意大利的外交既无法与美英苏相提并论,也远不如德法密切。南京大学蔡梓《尴尬的战时邦交:中国政府的对意外交及其演变(1937—1941)》指出,从七七事变到

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对意外交经历了三个层次的转变:外交角色定位上从争取为友的中立国到敌国,外交目标上从恢复友好合作关系到放弃意大利,外交策略上从适度接触到积极影响其延缓承认汪伪,但始终不能改变中意对立和外交决裂的根本趋势。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处理日本侵华的进程缓慢,原因之一是缺乏实际情报。南京大学陈海懿《国联调查团的预演:九一八事变后的中立观察员派遣研究》指出,在应中国要求派遣调查团之前,英美和国联的中立观察员赴实地考察,缓解了获取信息的难题,成为派遣正式调查团的预演。

美国从对日本侵华保持中立到对日宣战,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复旦大学王钊《全面抗战前期美国有关长江航运的对日交涉(1937—1941)》通过分析美国外交文书,指出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本封锁并垄断长江航运损害了美国的在华利益,美国的对日交涉起初以外交抗议为主,后来逐渐采取强硬手段,这反映了美国政策从严守中立到对日制裁的转变。

七七事变后,英国内部对于日本侵华曾经出现主张遏制的强硬派。南京大学徐一鸣《“瓢虫号”事件与英国“联美制日”的尝试》一文指出,1937年12月日军炮击英国在中国长江上的“瓢虫号”等商船后,英国以外交大臣艾登(Robert A. Eden)为代表的反绥靖派试图联美制日,遏制日本侵华,但受欧洲局势牵制和以首相张伯伦为代表的绥靖派反对而流产,成为太平洋战争之前英国对日绥靖政策形成的重要节点。

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的宗旨是“论文第一,讨论第一”,本届会议在组织形式上又有所创新。在延续往届不设论文宣读环节和分会场,直接进入论文点评和讨论环节的基础上,本届研讨会提前将评论意见印发作者,讨论时首先由作者直接回应点评意见,激发了更多学术观点的碰撞。会议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卞修跃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臧运祜教授、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张晓辉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蒋建农、左双文和肖自力教授等专家做分组主持和专门点评。5月11日晚,还举行圆桌座谈会,就青年学者成长过程中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治学经验、论文写作、外语学习、研究视角等畅所欲言。青年学者们深深体会到,这是一次匠心独运、充满教育情怀、令人受益匪浅的学术会议。

〔作者杨思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马晓娟)



Chengdu. However, the careless omissions and mistake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the process of disposal reflect the problems in its ruling logic and ability to deal with emergencies.

Wang Jingwei's Visit to Japan and the Internal Disputes in Japan in 1941 Zhang Zhan(68)

After recognizing the Wang Jingwei puppet governmen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war consumptions, decided to give priority to obtaining war resources in the occupied areas. This policy brought great practical pressure to the Wang puppet government. Wang Jingwei was eager to visit Japan and required the Japanese central government to adjust its policy towards Wang, but it was repeatedly rejected by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The main cause of Wang Jingwei's visit to Japan in 1941 was that Japa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organs in China reached a consensus out of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jointly pressed the Japanese central government. This process also shows the complexity of internal interests competitions in Japan.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decided to give Wang high-standard treatment, but did not make substantive adjustments to its policy. Wang Jingwei's visit to Japan eventually evolved from a political event expected by him into an ordinary ceremonial visit, which was also the result of a balance of disputes within Japan.

The Sino-British Negotiations around the Detention by the British-Myanmar authorities to the Foreign Loan Materials for Chin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uo Shuangwen, Ye Xin(81)

The Distribution, Reception and Use of Japan's Compensation Materials shipped to Shanghai after the World War II, 1947 – 1958 Xu Kun(99)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of the Executive Yuan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decided to accept Japanese compensation materials in advance and to bear the costs of transportation, storage, unloading and reloading. Facing multiple restrictions on funds, capacities and technologies, the Commission, with the help of concerned Ministries and Committees, reluctantly shipped all the first and second batches of Japanese compensation materials to Shanghai Port. However, after being handed over to the concerned units, they were unable to be repaired, reloaded and used. In 1949, when the Kuomintang's defeat was inevitable, it began to demolish and transfer compensation materials and even destroy materials that could not be transported away. With the liberation of Shanghai, the new established government began to take over the deployment, reloading and use of Japanese compensation material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de overall plans and effectively used these materials to concentrat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xtile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uring the three-year economic recovery period, and to strengthen the iron and steel smelting and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during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period.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in Japan Qi Jianmin(114)

Liu Danian and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hang Zhenkun(134)

A Work of Ultimate Rescue and Standardization—Comment on *The Memory of War: The Oral History of 100 Veteran Soldier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Li Jifeng(138)

Re-exploring the Truth through *Truth* Zhang Jingwei(142)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from the Regional Perspective—A Summary of the Second Symposium on Regional Research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Resistance in Hunan Luo Yunsheng(144)

A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n the Study of the Resistance History in South China Li Hao(149)

A Summary of the Sixth Young Scholars' Conference on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Yang Siji(153)